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BASED ON JOHN S. BRUBACHER'S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中国高等教育重审

基于约翰·S·布鲁贝克的
《高等教育哲学》视角

卢彩晨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BASED ON JOHN S. BRUBACHER'S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中国高等教育重审

基于约翰·S·布鲁贝克的
《高等教育哲学》视角

卢彩晨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从《高等教育哲学》视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等七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期待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重审：基于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视角/卢彩晨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 - 7 - 5682 - 3372 - 9

I. ①中… II. ①卢… III. ①高等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①G6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54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总编室）

(010)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申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9.75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高深学问	4
第二章 学术自治	22
第三章 学术自由	36
第四章 高等教育为谁服务	52
第五章 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	68
第六章 高等教育学	85
第七章 治学的道德	112
第八章 余论	130
参考文献	139

导 言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之所以如此，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认为，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1〕}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2〕}笔者深以为然。

从当下社会各界所议论的高等教育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有些人对大学创新乏力提出质疑，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些人对大学投入产出提出质疑；有一些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存在问题；有些人则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公平对待农村学生；另有一些人则对大学生就业率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已经开始担心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导致了社会和职业界逐渐开始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创新危机、质量危机、就业危机，甚至道德危机。因此，需要如布鲁贝克一样，从哲学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做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3〕}，借以发现深层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因为，“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之日”^{〔4〕}。也只有从哲学视角，遵循思维的“第一性”原理，即回归到高等教育的本源去思考基础性问题，才能找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

〔1〕 陈平原. 大学何为（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7-18.

〔2〕 陈平原. 大学何为（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8.

〔3〕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民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

〔4〕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民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

路径。

从近些年来中国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来看,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所启发,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许多研究成果纳入政府决策,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看,从哲学视角研究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或运用已有哲学原理和观点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多。而且,运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的理论和观点,从整体上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探讨的工作至今一直还没有人做。所以,本书想尝试着做这项工作。

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是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哲学名著。这本著作是在对20世纪西方高等教育的主要学派及其重要著作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学术自治与政府管控的矛盾、学术中立与高等教育政治化的矛盾、学术自由与公民自由的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化的矛盾、学生参与民主管理与教师的学术自由的矛盾、高等教育特权与人权的矛盾、自由教育 with 专业教育的矛盾、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矛盾、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矛盾、现代教育学方法与师生当面互动的矛盾、选修课与必修课的矛盾、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矛盾、课程的适切性与学科固有体系的矛盾、学业成绩与实际能力的矛盾、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矛盾、学术研究与接受捐赠的矛盾、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矛盾、学者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学者利益与学生利益的矛盾、学术兼职与本职工作的矛盾、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等等。

在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布鲁贝克主张要辩证地看待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要把握好各种问题的“度”。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可以说是一部解决高等教育各种错综复杂矛盾问题的经典之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解决高等教育矛盾问题的艺术佳作,它不仅对美国高等教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世界高等教育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尤其他在书中论述的八个问题中的七个问题(其中关于“作为教会的大学”在中国和有些国家不存在),是各国高等教育的最基本问题,也是大学的最基本问题。如果哪个国家这七个基本问题解决了,那么,其高等教育可能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相反,如果哪个国家这七个基本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那么,其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可能就要受阻,可能就不会发展太快。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和高等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期,发展于20世纪,恰恰与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以及其中所研究的西方高等教育同属一个历史时期。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方高等教育,其大学理念、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及高等教育学、治学道德等,在高等教育哲学视野中究竟有何异同?时至今

日,为何许多西方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为何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实践,中国至今仍未能加入高等教育强国行列?除了我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兴起时间比西方短,且期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本来就不十分成熟的高等教育遭受重创之外,是否意味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出了问题呢?如果是高等教育哲学出了问题,那么,究竟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出了问题,还是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出了问题?是高等教育学出了问题,还是治学的道德出了问题?本书拟以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分析框架为基础,试图运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的理论和观点,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重新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相同与不同之处;试图从高等教育哲学的视角剖析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寻找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期待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和省思,能对未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点滴启示。

在体系结构设计上,本书采用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章节相对应的章节结构。不过,需要说明两点:其一,由于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中的最后一章讨论的是“作为教会的大学”,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收了旧中国的教会大学,其后教会大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因此,本书只用前七章的理论和观点来对比分析我国的高等教育。其二,在《高等教育哲学》原章节基础上,在最后一章,拟通过余论对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尝试性地进行分析。一是根据笔者的认识,对因时代变迁导致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某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个别观点进行尝试性补充,毕竟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至今已30余年,其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能有的地方已经今非昔比;二是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此外,在每一章的最后都加了一个小结,作为全章的结论。这也是与布鲁贝尔《高等教育哲学》论述框架不同之处。

各章总体结构如下:首先探讨高深学问是如何存在于我国大学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否与布鲁贝克所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基础具有一致性?其表现形式如何?(第一章);中国的大学是否实现了自治,自治情况如何?(第二章);中国大学的学术是否自由?自由状况如何?(第三章);大学的门第应该向谁敞开,选择标准是门第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平等主义?(第四章);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第五章);中国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学?(第六章);中国高等教育是否需要一种比一般的道德更高的道德?(第七章);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否发生了新变化?高等教育是如何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有规律吗?(第八章)。

第一章 高深学问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引用普西(Pusey, N. M.)的话说:“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毫无疑问,中国也不例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大学进行理智的分析、鉴别、阐述和关注,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需要大学的熏陶和滋养,需要大学给予其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尤其现代社会,各种矛盾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整个世界和各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复杂得多,因此,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都更加需要大学,更需要高等教育。任何国家、任何人离开了高等教育恐怕都不能很好地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高等教育日益走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对高等教育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时代。

与此同时,布鲁贝克还指出:“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于这种训练的,而那些胜任这种训练的人必然能够发现这种训练,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的新的发现和明智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2]可见,大学要存在离不开教师和学生,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教师和学生做支撑,恐怕这所大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既然人类社会需要大学,离不开大学,那么,大学究竟满足了人类社会什么样的需求才使得其存在的呢?换言之,大学究竟凭什么立足于世的呢?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大学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布鲁贝克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3]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是如布鲁贝克所言,还是具有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呢?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期待能够从中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异,找到中国高等教育前进的方向和路径,以及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钥匙。与此同时,如果本研究能够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有所

[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3.

[2]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3.

[3]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3.

帮助,实为意外之喜。

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基础。第一种是认识论的。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作为目的。^[1]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只有越来越精确的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2]这说明大学对知识的探究在20世纪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不再局限于“闲逸的好奇”,而是逐渐从主观向客观事实转变,从验证缺失向知识验证转变。

布鲁贝克提出的第二种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的。人们探究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深远影响。“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3]这说明大学在民族国家存在期间,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即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是交替在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论的,他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随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4]到19世纪末期,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美国的大学里并存。^[5]从其存在的形式看,有的存在于不同学校,有的在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里。到20世纪,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不仅如此,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大学也经常名列前茅。^[6]可见,大学不仅是认识论的,也是政治论的。而且,认识论和政治论存在于不同的大学之间,有时存在于一个大学的不同学院之间。从中也不难

[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3.

[2]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4.

[3]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5.

[4]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6.

[5]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6.

[6]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7.

发现,20世纪美国大学形态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也许恰恰是这种多元化、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美国的许多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一样,两种哲学交替地起作用呢?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自1898年诞生第一所以“大学”为称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开始,总体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基本一样,也是以政治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存在于不同大学中,有的存在于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学院中,有的甚至存在于一个学院的不同学历层次之间。但是,与美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基础交替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同的是,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末期,我国兴起现代意义的大学。和美国大学兴起时一样,这一时期的大学也是将政治论作为其存在的哲学基础的。如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其办学目的都在于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培养人才。其中尤以京师大学堂最具有代表性。根据皇帝上谕和学部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培养通才,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1]其政治论哲学基础,显而易见。

进入20世纪初期,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从以政治论为基础,转向政治论和认识论基础并存的时期。如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和整顿。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通过加强课程建设,改学年制为选科制和学分制,以沟通文理,加强基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2]另一方面,重视科学研究。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认定研究学问是大学的主旨。而且,通过办图书馆、创办北京大学报、组建研究所、建设实验室、改善科研条件、邀请中外著名学者到北大讲学、鼓励成立各种科研团体等,在北大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正如吕思勉在《蔡子民论》中言:“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这真是子民先生不朽的功绩。”^[4]此后,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

[1] 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5.

[2] 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9.

[3]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A].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

[4]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294.

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1] 1929 年秋，清华大学开办研究院，到 1935 年，共设立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设 10 个学部，均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为了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清华与德国等建立了互派研究生制度，设置科学讲座等。^[2] 上述可见，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并存于大学之中，当时的高等教育是以政治论和认识论为共同基础的。

再比如，20 世纪 30 年代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 1938 年在昆明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集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于一身。当时，西南联大既注重基础课教学，大多数知名教授亲自讲授共同必修课。同时，也十分注重选修课。选修课名目繁多，课外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成绩斐然，在异常艰苦的 9 年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据统计，从 1938 年至 1946 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 8 000 人，毕业生约 3 800 人。在他们中间，有 1 000 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院士、教授和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和编辑、诗人、作家、总经理、高级法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在西南联大一些院系的毕业生中，有接近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人在其后来的工作领域内有突出的贡献和很高的知名度。例如，算学系有毕业生 70 人，其中 54 人后来成为高级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有 1 人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物理系共有毕业生 130 人，后来成为知名院士、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者达 71 人。^[3]

为什么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却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业绩？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把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国难当头，激励师生以学报国；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了蔡元培“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以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4]的精神传统，师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5]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主要是政治论的。具体表现是，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接管、接收、接办和初步改造。对公立学校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进行接收，对私立学校进行接管和接办，使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为帝国

[1] 郝维谦，龙正中. 高等教育史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4.

[2] 郝维谦，龙正中. 高等教育史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5.

[3]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汇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

[4] 周川. 百年之功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83-85，88.

[5] 刘述礼.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32.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转变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与此同时,为了培养新中国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创办了一所以苏联经验为样板的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其办学目的在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1]。改造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其目的在于“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2]。两所新大学的建立,政治论哲学意味不言而喻。

正如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的终结,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与美国的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为国家服务的大学”十分相似。

进入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更加凸显。1956年5月,高等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才。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基础得到巩固。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意味更加强烈。“四人帮”一伙肆意改造高等教育的办学性质和办学目的,声称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了当时整个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政治论哲学在大学占据绝对地位。当然,这种为政治论而政治论的做法,也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它告诫我们,高等教育可以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这无可厚非,世界各国皆如此。但是,不能把高等教育机构、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7.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16.

[3] 郝维谦, 龙正中. 高等教育史 [M].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121.

把大学等同于政治组织,变成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忘记甚至抛弃了高等教育是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重新进入政治论与认识论并存时期。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巨大破坏,人才培养脉络被撕裂,而经济社会发展却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抓紧培养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基于危机意识,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十分注重科学研究,并在以往建设重点大学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985”“211”工程建设任务,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校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人才培养方面,1995年,“211工程”学校在校学生为本科生62.15万人,硕士研究生7.89万人,博士研究生2.19万人。2005年,在校学生为本科生157.95万人,硕士研究生48.58万人,博士研究生14.30万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分别是1995年的2.54倍和6.23倍。十年来,累计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留学生的人数分别为242.17万人、50.62万人、11.69万人和11.27万人。^[1]与此同时,从1999年到2007年,教育部共进行了9次“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选出了884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和指导教师基本上都集中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985工程”的高校入选优秀博士论文每年都在50%~60%之间。在科学研究方面,在“211工程”和“985工程”支持下,各学校开展学科前沿研究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明显提高,取得了很多重大研究成果。在国家各部门和地方的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211工程”高校也占了绝大多数。此外,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排名靠前的基本上都是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校。

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强调协同创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文件相继出台,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为共同基础的时代。

上述可见,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并存于高等教育之中,这与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没有什么区别。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国情,或突出以政治论为基础,或突出以认识论为基础,或二者并重。各种选择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都具有客观性,无可厚非。

但所不同的是,自从我国兴起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

[1] “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 “211工程”发展报告(1995—2005)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5.

基础从未中断过,认识论哲学基础却不同,它处于一种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状态,有时甚至表面是有的,但实质是间断的。如果将二者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划分的话,政治论哲学基础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认识论哲学基础占主导地位的时间长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教授所言,我国大学的政治化倾向还比较明显:“国家不断强化对大学在组织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政治领导,意识形态控制全面深入,存在着重新回到‘姓社姓资’问题的一种新倾向。”^[1] 阎光才教授也认为,“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纳’到‘主动赶超’的过程。在百年动荡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因为‘学术’与‘政治’间始终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因缘,中国学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它的西方摹本之间既有某种一致性,同时又存在巨大的张力。在学术与政治纠葛不清的爱恨情结中,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主导逻辑,一方面促成了学术界与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因而使得体制内的学术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它自主构建的生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今天,国际化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复杂内涵,它的确代表了学术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姿态,但在这种‘主动’姿态背后的主要推手却依旧是政治与国家。”^[2] 可见,中国在对高等教育政治论的度的把握上还不成熟,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度,还处在不断调试的过程之中。如何处理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关系,如何既能够发挥大学的政治功能,又能够避免大学政治化,仍然是我国大学今后一段时期需要认真进行探讨的问题,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如何避免大学政治化,陈学飞教授建议:“我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回头看,需要总结和吸取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制度要改革,有些传统要回归和坚守。我国的大学具有政治性,但大学不是政治组织;大学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大学也有功利,但不能成为主导的追求。”^[3] 笔者深以为然,世界各国都认同大学的政治论哲学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都十分注意避免把大学建设成为政治组织,因为毕竟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大学的本质属性在于学术性,而非政治性。因此,未来时期,我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还需在恰当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上做出努力,要切实保证大学的学术性,同时,又能够确保大学为国家服务而不变成政治组织,如此,大学才能建成一流,高等教育才能强国。

[1] 陈学飞. 导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 [J]. 探索与争鸣, 2016 (7).

[2] 阎光才. 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6): 21.

[3] 陈学飞. 导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 [J]. 探索与争鸣, 2016 (7).

哲学的冲突

从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来看,在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存在着巨大冲突,形成了三派。一派认为,高等教育是价值无涉的,甚至是一种闲逸的好奇,如果说它发挥了服务功能,那也是为全社会全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仅仅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服务的。一派认为,“大学教授不再是为民主社会服务的社会改革家,而成为民主国家服务的改革家”^[1]。教授作为民主社会的改革家,能够保持价值自由的思想,但是,如果作为民主国家的改革家,其价值自由就很难判断了。第三派认为,高等教育没有必要做出认识论与政治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多元的。因此,各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对于其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有其优越性的。其优势就在于,正因为很多大学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鼓励“闲逸的好奇”,甚至支持“闲逸的好奇”,因此,大学总是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总能揭示和发现更多的世界奥秘,总能不断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这也许是美国大学获得诺贝尔奖数量多的理论基础和根基。与此同时,也许正因为大学同时又是政治论的,因此,才确保了能够为大学所在国家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所在国家提供丰富的社会服务。

在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基础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有些学者主张大学要回归经典,要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要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在办学实践中,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以科研论文的数量为准,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将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标准。还有的学校规定,不同职称的教师每年要争取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如果争取不到规定数量的科研经费,那么,就得走人。表面看,我们的学校都十分重视科研,但实际上,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评价制度下,其实并没有产生多少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我国这些年没有几人获得诺贝尔奖就可以窥见一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主张高校要注重科研的思想一直存在,大学要不忘认识论的思想一直存在,这也许就是我国大学不久的将来进入世界一流的星星之火。

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大学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社会提供服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培养人才是大学的根本,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副业。在他们看来,如果科学研究是大学的主要任务,那么,还用那么多科研院所何用?如果科学研究是大学的主要任务,那么,大学就

[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9.

有变成研究机构的危险。比如王荣年就认为：“高等学校的根本职能是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至于承担其他职能，那就应该根据高校完成任务的‘承受能力’以及处理多种职能之间关系的‘结合艺术’，也就是说高校应在首先保证并不断提高教育水平（包括数量与质量）的前提下，结合教育，实事求是地多承担些符合高校特点的其他任务，力争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多做些较高水平的贡献。”^{〔1〕}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指出：“高校教育职能的内涵也是‘多层次’的，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等，其中根本任务理应是本科教育。这是因为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浩浩荡荡的知识大军中，主要力量正是本科层次的人才，在我国发展社会与经济所需要的高等专门人才结构中，本科生首先是独立层次，尔后才是研究生的生源与基础。”^{〔2〕}而郑南宁院士则认为：“研究型大学也要培养优秀的本科人才。一所大学存在的价值，就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就是要把充满着理想的这些年轻人，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让他们树立起做学问的理想。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在学校的管理层面上就会出现問題。”^{〔3〕}

但是，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基础似乎始终没有表现出如美国那样的剧烈冲突。原因在于，自清朝末期我国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之日起，其目的就在于要彻底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在于如何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服务。此后，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都是如此。为国家服务的目标始终如一，十分明确。大学的科研目标也是如何为国家服务，人才培养更是如此。所以，政治论基础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十分牢固，而且，在大学内部和社会各界基本上达成了惊人一致的程度。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基础没有像美国那样发生剧烈的冲突。但是，我国却在高等教育属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上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教育和高等教育究竟属于经济基础，还是属于上层建筑之争十分激烈。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属于经济基础，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是上层建筑。概括起来大体有四种观点：“一、教育是上层建筑；二、教育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不属于上层建筑；三、教育与生产直接联系，或教育就是生产力；四、教育是不能用生产力、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来归类的社会现象。”^{〔4〕}几种观点互不相让，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

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冲突与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冲突截然不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冲突是围绕高深学问的价值展开的，即高深学问是

〔1〕 王荣年.论本科教育是高校的根本任务[J].江苏高教,1987(5):2.

〔2〕 王荣年.论本科教育是高校的根本任务[J].江苏高教,1987(5):2.

〔3〕 郑南宁.把本科教育放在大学工作最根本的位置上[J].中国大学教学,2007(9):5.

〔4〕 潘懋元.在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讨论中若干有待商榷的问题[J].学术月刊,1979(12):

否应该价值中立，高深学问是否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而我国对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争论则主要在于高等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还是属于经济基础，主要是围绕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展开的，尤其高等教育如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似乎始终占据上风，这可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有关，也可能与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长期重视不够有关，或者与高等教育中的“政治论泛化”有关。学者们寄希望于通过讨论，确立我国高等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地位，以引起国家对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

不容置疑，我国关于高等教育属于经济基础还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争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学术交流，对于明确高等教育和高校的社会属性和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质上，这种争论偏离了大学的逻辑起点，偏离了大学的本质问题。实际上，等于从理论上把大学的本质属性——“高深学问”搁置起来，置之不理。其后果是，使我国高等教育陷入了社会地位和权力之争的怪圈，不仅没有解释清楚“高深学问”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而且由于这种无谓的讨论，淡化了大学对“高深学问”的重视，淡化了大学对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的重视，使大学忘记了存在的目的。这也许是我国时至今日极少有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源之一。

政治论哲学盛行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整个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更是政治论的。正如布鲁贝克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把霍姆斯的学说运用到学院和大学时，就会发现，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初，为了准备生活而进入大学和学院的学生现在发现，学院和大学本身就是生活，它们不再是一首插曲，而是成了主旋律。今天的大学受到了市政厅、州及联邦国会前所未有的重视。”^{〔1〕}在美国，“如果大学没有加入这一历史发展之中，一些人就认为它成了空中楼阁，落到了时代后面，甚至是反生产力的”，学术就变成了“贫血”的代名词。可见，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高等教育政治论基础已经取代兴旺了几百年的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在各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在我国，情况如何呢？是否也是政治论哲学盛行呢？

回答是毫无疑问的。从我国历史上看，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论性质，也可以说具有深厚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此后，无论辛亥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徐辉, 张民选,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1.